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智库者说

以文化惠民浸润百姓生活

核心阅读

文化惠民从注重“有没有”的基础覆盖阶段,迈向聚焦“好不好”的品质提升新阶段;从强调“普惠化”的广度拓展,转向突出“对象化”的精准供给。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破解当前文化惠民工程中的矛盾与障碍,才能真正让优质文化艺术资源直达基层、浸润百姓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推动高品质文化惠民活动,本质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体制壁垒,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呼唤我们倾听群众心声,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创文化”的跃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目前,文化惠民工程已实施了18年。文化惠民从注重“有没有”的基础覆盖阶段,迈向聚焦“好不好”的品质提升新阶段;从强调“普惠化”的广度拓展,转向突出“对象化”的精准供给。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系统破解当前文化惠民工程中的矛盾与障碍,才能真正让优质文化艺术资源直达基层、浸润百姓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十四五”时期文化惠民展现新图景、新活力

“十四五”时期,各地积极探索文化惠民新路径,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创新实践,展现出艺术家群体与人民群众“双向奔赴”的生动局面。这种双向互动不仅拉近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更拓展革新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逻辑。

惠民演出实现“精品化+零门槛”融合。近年来,各地以“打开艺术之门”等惠民演出活动品牌为代表,通过财政补贴、院团公益活动、场地让利等方式,将高水平演出票价控制在一定区间,几乎场场爆满,体现出大众对艺术演出的渴求。此类演出普遍增设艺术导赏环节,由专业讲解员或主创人员现场解读作品背景、艺术特色与审美要点,有效降低公众理解门槛,使高雅艺术真正“可亲、可感、可及”。这种“演前导赏+现场体验”的模式,既保障了艺术品质,又提升了观众参与深度,实现了文化供给与接受的良性循环。

户外演出打造“流动的艺术风景线”。城市公共空间正成为文化表达的新舞台。北京天桥市民广场上的国家级演奏家露天音乐会、西安古城墙下的非遗艺术家表演、上海演艺大世界的公共空间戏剧互动等,将艺术从封闭剧场移至开放街区,以流动性、互动性和在地性为特征,让市民在日常通勤、休闲散步中偶遇艺术、参与艺术。这种“艺术走到群众身边”的方式,不仅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物理边界,更重塑了城市的文化肌理,使艺术真正融入市民生活,成为城市精神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民夜校回应都市青年的“美育刚需”。面对中青年“上班族”旺盛但易被忽视的美育需求,多地公共文化场馆推出延时服务,开设书法、绘画、舞蹈、戏剧等夜校课程。这些课程由公共文化场馆聘请专业艺术家或社会组织授课,时间安排契合职业群体作息,内容设计注重实用性与审美性。上海、深圳等地的“白领夜校”常常“秒光”,反映出都市人群对精神充电的迫切渴望。这类错时、增值型服务,正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从“保基本”向“促提升”转型的关键切口。

素人创作激发普通人的“舞台梦想”。从上海中华艺术宫的“素人策展计划”到苏州当代美术馆的“社区艺术画像计划”,再到不少城市的戏剧工坊,越来越多的专业文化机构主动下沉,为普通市民提供创作指导、排

进一步推动“十五五”时期文化惠民提质增效

进一步推动“十五五”时期文化惠民提质增效,必须首先把准当前文化惠民推进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绩效认可体系,导致高水平艺术供给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艺术院团、高校等作为优质文化资源的核心载体,普遍以“高精尖”“殿堂级”为价值导向,文化惠民动力不足。即便部分单位因公益考核指标被动开展活动,也易出现“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二是公共文化场馆创新服务能力受限。多数公共文化场馆仍沿用传统管理模式,开放时间固定,服务内容标准化、同质化,难以满足中青年群体错峰、分众、个性化的需求。相比之下,实施社会化运营的场馆则更具灵活性与市场敏感度,能快速响应新兴需求,推出夜校、工作坊、沉浸式展览等多元服务。这种效能落差,凸显了深化公共文化机构改革的紧迫性。三是财政扶持资金投入存在资源错配。当前文化惠民资金分配机制尚不完善,部分项目“重投入、轻评估”,导致内容供给与群众真实需求错位。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未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四是政府文化治理能力有待系统性提升。面向“十五五”,唯有以更大魄力深化改革有效破解文化惠民提质增效面临的难题,以更实举措精准服务推动优质资源的有效下沉与精准匹配,方能让高品质文化产品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亿万人民在美的滋养中走向更加丰盈的精神生活。

首先,强化激励机制,激活供给主体内生动力。应建立文化惠民贡献度评价体系,将艺术院团、高校参与基层服务的成效纳入职称评定、项目申报、评优评先等考核指标。设立“文化惠民杰出贡献奖”,对长期扎根基层、创新服务模式的艺术家和团队给予荣誉与物质双重激励。同时,探索“公益+市场”混合模式,允许院团在完成规定惠民任务后,通过衍生品开发、线上课程等方式获得合理收益,形成可持续参与机制。

其次,推进社会化运营,提升场馆服务效能。鼓励具备条件的公共文化场馆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管理等方式引入专业文化企业、社会组织运营。政府角色由“办文化”转向“管文化”,重点制定服务标准、监督服务质量、保障公益属性。运营方则可根据区域人口结构、文化偏好,灵活设置错时开放时段,开发分众化、主题化、体验式服务产品,如青年艺术沙龙、亲子美育工坊、银发数字课堂等,真正实现“按需供给”。

再次,建立健全培养机制,畅通社区文化毛细血管。基层文化活力源于群众自身。应系统发掘和培育“社区文化领袖”——如广场舞队长、读书会发起人、非遗传承志愿者等,通过小额项目资助、专业培训、资源对接等方式赋能其组织能力。同步推动社区文化空间线上预约开放,建立“群众申请—志愿管理—专业督导”运行机制,纳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统筹管理。让“身边人办身边事”,形成自下而上的文化生态循环。

最后,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建立文化惠民项目全周期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活动参与度、满意度、社会影响力进行量化评估,作为后续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推动数据共享与智能匹配,利用文化云平台分析用户画像与需求热点,实现“精准滴灌”式供给。同时,简化户外文化活动审批流程,明确安全责任边界,鼓励“备案制”替代“审批制”,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松绑赋能。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艺术如光,照亮人心。推动高品质文化惠民活动,本质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体制壁垒,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呼唤我们倾听群众心声,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创文化”的跃升。当艺术不再高居殿堂,而是流淌在街巷、活跃于社区、生长于人心,文化自信便有了最深厚的土壤和最温暖的底色。

(据《光明日报》 杨越明)

思想纵横

以文化之力铸就乡村之美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繁荣乡村文化”。

近年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和实效性持续提高。截至2023年末,就有超过91%的乡镇有文化站,超过71%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竞相出现村跑、村舞、村厨、“村BA”等乡土特色浓郁、农民喜闻乐见的乡村文体艺术活动。文化激发乡村活力、群众动力,形成昂扬奋进、向上向善的生动局面,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独特的赋能路径。

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呈多层次、多元化趋势,部分地区仍存在文化服务不均衡、城乡失衡等挑战。对于广大乡村来说,文化赋能绝非锦上添花,而是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引擎——它以历史文脉激活身份认同,以城乡交流破解发展鸿沟,为美丽乡村注入灵魂。新征程上,以文化之力铸就乡村之美,要让新时代农村既生活富裕,又精神富足。

文化赋能美丽乡村,根植于中华文明基因与乡村内生需求,是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精神空心化”的关键。乡村所特有的民俗风情、历史记忆、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共同构成了群众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文化赋能的首要价值就在于激活历史文脉,筑牢身份认同之基。通过系统性修复传统村落,举办非遗文化节等活动,让村民在参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重新发现家乡的文化魅力,从文化认同转化为建设共识,为美丽乡村奠定情感基础。

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能激活乡村沉睡资源。经济上,文化与乡村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乡村旅游、文创产业、特色手工艺等新业态、新模式,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上,乡村文化中蕴含的“守望相助”“孝老爱亲”“诚信友善”等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能够优化乡村治理效能,体现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美丽乡村内核。不断提升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创造力,彰显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可助力吸引城市资本、人才“回流”,同时输出优秀文化,实现城乡互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与魂”,文化赋能需遵循“传承为根、创新为魂、融合为用”的内在逻辑。以传承守

正固本,推动文化资源“活化”,通过系统保护与整理,全面普查古建筑、古遗址、非遗技艺、民俗传说、传统节庆等,登记并建立数字化资源库;同时,改变以往单纯的静态保护模式,创新性推动传统技艺的延续和发展,开发特色文创,变“静态展示”为“动态体验”,从“有”向“优”升级,让村民在“守艺”中增收。

我们要以创新提升服务质效,实现精准供给。以村民为中心,以构建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为基础,动态更新街(镇)、社区(村)综合文化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内容。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村民的需求,为青年定制“数字文化屋”,为中年传授“农业技艺”,为长者开设“乡愁课堂”;激发自治活力,鼓励村民组建文艺社团,让活动“从村里来、到村里去”。

文化产业是文化赋能的重要经济引擎,要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引领—旅游消费—乡村振兴”生态链。深挖乡村特色资源,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办好乡村文化产业创意大赛,开发乡村文化地图;利用数字技术,开展乡村文化题材和农耕文明主题的微视频、微动漫、微短剧征集,做好“农遗良品”“农耕好物”推介等。

文化赋能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以组织、人才、制度“三位一体”的支撑网来确保长效化。基层党组织是“主心骨”,坚持党建引领,将文化赋能纳入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和工作考核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推动多元协同,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村民参与”的发展模式,实现共建共享。

加强乡土文化能人培训,组织有文艺特长的农民文化骨干和带动力较强的乡村文化产业从业者,依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乡土村艺工坊等,因地制宜举办非遗、技能等专题培训班,着力培养一批乡村文艺创作者、乡村文化传播者和农文旅融合型产业带头人,让“土专家”成为兴村主力军。

制度是赋能的“压舱石”,要不断完善政策与评估机制。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全面开展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工作,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时,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将遗产保护、村民满意度、产业效益等纳入美丽乡村考核,确保文化赋能可衡量、可考核、可持续。

(据《光明日报》 宋 阳)

专题深思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不仅要关注物质空间建设,也要重视精神价值塑造。今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要求“优化城市文化产品供给”。作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重要空间,城市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高品质追求,优化城市文化产品供给是增进文化福祉的重要路径。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核心途径。不断优化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要创新文化业态,以优质内容为内核、数智技术为支撑、融合发展为路径,着力破解供给同质化、体验单一化等问题,构建多元共生、创新引领的文化供给新机制,推动文化从“配套角色”转向“关键引擎”,促进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积极构建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体系。

传承城市文脉,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传承城市文脉”。文化是城市的气质和灵魂,是城市的独特标识。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城市文脉是不断优化城市文化产品供给的基础。要深入挖掘本地独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活化更新,打造特色文化体验,因地制宜培育城市文化名片。例如江西景德镇传承创新陶瓷文化,改造老瓷厂融合新文创,提供陶艺制作体验、春秋大集等产品,将文化底蕴转化为时尚产品,丰富城市文化产品供给形态。景德镇的实践表明,对地方历史、传统技艺、人文精神进行现代化转译与艺术化呈现,能够将城市历史文化元素转化为现代文化产品与服务,重塑城市文化表达方式。让城市文脉持续融入当代生活,还可以借助创意设计提升街区美学品质,比如推动老旧厂房、街区转型为融合动漫创作、影视取景、数字文旅体验的复合空间,推动城市从“空间更新”向“内涵升级”跨越。北京首钢园将旧厂房改造为冬奥博物馆、首钢滑雪大跳台,推出沉浸式工业剧,融合工业历史展览与现代艺术体验。这种供给模式既保留城市记忆、传承地方文脉,又为城市更新注入人文活力。

坚持以文惠民,构建普惠可及的文化服务体系。文化福祉提升的关键在于文化产品供给的普惠性与可达性。普惠性关注文化服务范围的广度,使文化产品无差别触达各类人群;可达性致力于消除参与门槛,使人民群众能够便捷、平等地融入文化场景,实现从“可及”到“可参与”的深化。要创新文化服务模式和手段,构建高效、友善的公共服务接口,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丰富社区活动、优化空间规划、引入优质资源,将文化资源嵌入日常生活圈,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促进文化服务均衡化、普及化,

不断拓展城市文化产品的覆盖广度与感知深度。深化跨界融合,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文化产品供给的核心效能在于通过价值创新催生城市经济新业态。强化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支撑、创新供给模式,推动城市产业突破传统边界,将文化符号与审美体验转化为具体的消费模式与产业形态,能够为城市经济结构拓展高附加值的增长维度。要深化文体旅融合,通过资源共享、产品互补、市场共拓、品牌共建等构建“文化+体育+旅游+商业”的融合业态。如“村超”“苏超”等赛事火爆出圈,带动了当地文旅快速发展,在优化文化产业结构的同时,通过高附加值业态为城市经济注入新动能。要强化科技赋能,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数字博物馆、智慧旅游、交互式艺术展览等体验模式,推动文化从物理空间延展至数字场域,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共创,不断拓展城市文化产品的覆盖广度与感知深度。

强化协同治理,优化文化发展制度环境。优化城市文化产品供给离不开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从过去政府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转向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将不同服务主体凝聚起来,以更好适配文化领域的新变化、新需求,实现文化资源的高效整合与服务优化。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加大文化立法力度,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深化文化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协调机制和督察制度,加强版权保护,打击侵权盗版,构建版权、商标、专利一体化保护体系,为文化创意营造规范有序、激励有效的制度环境。创新服务与管理模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城市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针对性和丰富性,增强其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据《人民日报》 向 勇)

析理论道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近日,深圳“创意十二月”活动在书城“湾区之眼”拉开帷幕。这座屹立于城市核心区的文化地标气质时尚雅致,为大众阅读、参与相关体验活动营造了浓厚氛围,已成为当地探索以新业态重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不单在深圳,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也在打造以书店、图书馆、文化驿站等为核心的普惠阅读空间,一个个“城市客厅”“大众精神家园”正悄然融入日常生活,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添彩增辉。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传递主流价值、凝聚社会共识的使命,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既是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关键在于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构建“问需于民、借力于众”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方面,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精准服务机制。畅通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渠道,增强群众的文化参与感,提升服务实现精准供给。另一方面,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关系,健全多元参与机制,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能够激发文化服务的活力,更助力实现了文旅深度融合,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也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创造了更多可能。2019年,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动文化数字化成果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为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提

供了政策指导。数智技术赋能,可以有效补齐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空间限制和体验感不足的短板。

强化数字互联互通能打破空间壁垒。针对传统服务现场参与感不足的局限,不少文博场馆依托数字交互、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技术,将众多可移动文物转化为线上观赏资源,打造“云展览”“云游览”等新场景,让静态文化资源“活起来”。如此,既拓展了服务半径,又提升了群众体验。

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数字展厅网页,公众可通过数字交互选择想要观赏的展品,或在“风展红旗如画”的展品中感受革命前辈的英勇无畏,或在“中华文明云展”小程序中领略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搭建跨区域、跨层级的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有利于打破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地区的资源分割格局,促进优质文化资源全域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内外贯通,实现共建共享。例如,由“珠三角城市文化馆联盟”推出的优秀原创作品线上展播,整合广州、深圳、珠海等多地文化机构资源,集中呈现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善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构建智能治理闭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供有力支撑。例如,敦煌研究院通过智能传感器实时采集莫高窟环境、文物本体、游客承载量等数据,开展交互分析与风险预警,为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升级树立了典范。

持续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深化体制改革和数智赋能,多措并举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助力公共文化服务转型升级,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行稳致远。

(据《光明日报》 陈静茜)